



丹寧說可以批評法官！

近三兩年，香港社會輿論、或應該具體指明「反政府」陣營以外平民百姓的輿論，普遍對於香港各級法院判決和量刑之漫無標準，顯然頗有意見。簡而言之，就是在二零一四年非法「佔中」以後，較多法官大老爺疑似對於涉及反對派和非法「佔中」的案件從輕發落，而對於執法人員則疑似從嚴處置。

在國際體育圈中，我們的鄰國大韓民國在各種競賽的裁判判績就有點不乾不淨，二零零二年世界盃足球賽就有多次疑似偏袒韓國隊，結果他們接連地即神奇蹟似的淘汰了意大利和西班牙兩支歐洲勁旅。球迷稱功勞不小呀！球迷稱類似不正常的判判誤判為「黑哨」。後來意大利和西班牙分別在二零零六年和二零零零年先後奪得世界盃。

過去在足球場上，球證有至高無上的權威，筆者小時候球證都穿黑色制服，香港球迷一直戲稱他們為黑衣判官。經過許多年無數的誤判，球證的權力大幅下滑，今屆世界盃多了視像技術協助，不再是球證判官老大人一個人說了算。

回到今天香港的法治，小市民是否可以批評各級法院的法官疑似誤判？是不是清一色不能評論，否則就可以當為「藐視法庭」？

筆者認為，當下香港法律界的頭面人物，在評論法律觀點時，經常會出現不大靠得住的情況。比如，香港的什麼大法官、大學法學教師胡說「香港的政制是三權分立」即是一例。潘某人沒有法律專業資格，不過英國憲法學的課倒也上過。當

年來自英倫的老師千叮萬囑，言道英國的政制不是「三權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而是「三權分工」(Separation of Functions，此為本人所譯，這概念現時未有統一的中文翻譯)。香港在殖民地時代借鑑英制，英制不是三權分立，港英也就不能是三權分立！那為什麼要強迫香港在回歸後改用三權分立？至於各級法官、各公會主席和各大學教師為什麼會擺了這個大烏龍，錯誤理解英國西敏寺模式政制？箇中因由恐怕不足為外人道，潘某人這個法律界權外人也就不好妄加猜測了。

回到市民是否可以批評法官判決的爭議，二十世紀英式普通法的最權威丹寧男爵(一八九九至一九九九年)的名言，可以說是重中之重，權威中的權威。比本港任何一位法官、教師和政府官員更有一錘定音之力、一言九鼎之效。

丹寧曾經引用英國哲學家邊沁(一七四八至一八三二年)的名言(在此只引筆者的翻譯)：在保潔催生的黑暗之下，任何事情都可能出錯。但如果過程真正公開，你就會見到法官自重。遇上法官行為失當，應該容許傳媒批評，這樣才可以令所有人守規矩。

換言之，丹寧勸爵認為傳媒有批評法官的自由！

我們應該順應時代巨輪的方向，過去足球場上任何球證誤判都不能改變，今天還要加上場外協助判決。香港人過去太過迷信法官不能批評的教條，現在應該聽聽丹寧男爵的訓示，確保所有人、包括法官都守規矩！



寵物雞慰心靈

最近看到一則報道，美國的一些所謂精英人士最近流行飼養的寵物是雞，寵物店還出售花巧的雞屎片、衣帽和飾物等。城市街頭新景象不是牽狗，而是紳士淑女彎着頭打扮得花姿招展兼貴氣的公雞或母雞，又或抱在懷裡說悄悄話，現代人心，也實在教人哭笑不得。

雖然各類禽畜之中，雞是人類宰割最大量，也是日常膳食中最普及的食物。但最近一些研究報告顯示，雞隻的智力一直被低估，牠們在某些方面的表現達到高智商動物的水平；報告又發現不同的雞隻性格各異，實非只會下蛋或清早啼叫的平凡之輩。因此，時尚之士流行把雞隻像寵物般飼養起來。在寵物雞市場愈來愈大之下，相關產品如衣服、鞋帽、玩具、恆溫雞籠，甚至屎片應運而生。我相信雞族也快被人類這宰與愛之間的態度弄瘋！

在無懼禽流感下，這股養寵物雞潮也開始在台灣醞釀；而日本這幾年來有養雞作寵物的風氣。

我不是在鬧市長大的。雞，是我和農村小孩子的玩伴，尤其是仍長着黃絨毛的小雞，追着笑着聽着牠們吱吱的叫聲，便

可以樂上半天。待雞長大了便每天去拾雞蛋作佳餚。雞，應該屬於鄉村的；到城市時，牠已是碟上的一道菜式。

養寵物對不少人來說是因為心靈空虛，找個伴兒，養狗養貓養魚養兔養養老鼠養烏龜……不知道這些寵物是主人的玩具還是傾吐心事的對象。雖然說雞隻智商高，相信也不至於懂得給人類一個擁抱或一個慰藉的動作吧？但肯定是雞隻不會出賣你！牠的咯咯咯啼叫，可能是些深情的安慰說話。

看似是城市人的無奈，不過無論如何，如果找不到可信任的人讓你傾吐心事，對一頭忠誠的動物、一個只默默望着你的布公仔、一杯酒或任何一樣伴着你的東西，好好地宣洩心底的情緒，也是一個方法，總比獨自孤獨地悶在心裡的好。



■城市人新一代的飼養寵物竟然是雞。作者提供



通勤之路(下)

上次說到北京通勤難之一大原因：公共交通使用率低。在各種不方便、耗時長、辛苦、危險以及低廉的打車價格夾擊之下，很多「坐車的」都要選擇打的，要麼選擇自駕。這也可謂是「坐車人之苦」。

那麼「開車人」呢？也苦。開車人分為兩類，已經有車的和沒車想買的。沒車想買的，其苦在搖號。北京的搖號制度可謂真奇葩，明明目的是限購，效果卻變成了促銷。一方面誰都拿不準政策，想着還是以為以後萬一有需要要做個準備比較好，一方面一個車牌號在北京的年租價已過萬元，而重要的是搖號成本為零，所以不搖白不搖啊，於是可買可不買都來湊熱鬧。其結果就是剛需的搖不上，不需要的搖上了就再買輛便宜車佔車牌，無形中增加了車輛和車位佔用，造成浪費和擁堵。而已經有車的，包括那些打的，其苦更簡單明了：堵。北京之堵聞名遐邇，成因大致可歸為三個：車輛太多；城市太大及道路規劃失誤；停車場缺乏。

第一個車多，主要是前文所述的公共交通不給力，購車、養車、打車成本過低，以及搖號制度造成。

第二個城市太大及道路規劃差，二者互為因果。北京是典型的攤大餅型城市。歷史原因造成市內大院眾多，它們集辦公住宿為一體，門禁森嚴，獨立成區。同樣性質的還有地產開發商為降低成本而往往大片拿地，建成超大型小區。這些封閉的街區，必然會導致道路變少，而北京的路網密度確實在一線城市中倒數第一。有資料顯示，擁有40萬人的超大型小區天通苑，2015年時進城的路只有兩條，每天早上從天通苑開出的5號線都是直接滿員，到惠新西街南口之前都是「天通苑專列」；22萬人的回龍觀，進城基本只有一條京藏高速，有網友吐槽，住在回龍觀，單位距離只有7公里，卻能堵一個半

小時。除了街區大，北京的樓房也普遍較低，甚至6層樓房比比皆是，土地利用效率差，只能不斷佔領新地，加上環路思想作祟，一環套一環，餅愈攤愈大。

至於北京道路的兩大特色，寬馬路和環路，可以說是擁堵的直接肇事者。甚至都不必看其他城市的成功案例，只要玩玩電腦遊戲比如《模擬城市》，就能明白城市靠路寬是解決不了通勤問題的。道理很簡單，多車道馬路，路雖然寬，但出口往往只是一條車道，在並線過程中以及在出口的地方極易造成擁堵，且很快會牽連到主路，同理的還有掉頭。至於環路，是人為地把許多道路切割成斷頭路，車輛到這裡時被迫要加入主幹道，又增加了主幹道壓力。

第三個停車位問題。有個學者曾在電視上吐槽，說北京直到2000年建起的樓盤都沒有停車場的設計考慮。統計顯示北京的停車位缺口超過50%。北京所有的街道上，現在沿街兩邊都停滿了機動車，有的飯店街甚至出現了路邊雙層停車的情況。街道胡同本就不寬，兩邊再一停車，不堵才怪。另一方面，路邊停車，最先侵佔的是騎行車道，騎單車的人被擠到快車道上，天天以命相搏。

最後說兩句「走路」的。作為馬路上的「弱勢群體」——一個行人，小理在對比北京和香港後的一個明顯感受是，香港的道路設計是以行人為第一位的，而北京的道路設計則是以機動車為第一位的。也所以，在香港，行人可以輕鬆而快速地完成短途，效率極高。而在北京，動輒把一個走路的人發配到半站地外去上橋下地道以穿越16車道的馬路那是常事。而單單家門口的一個紅綠燈，每次綠燈一亮小理便拔足狂奔，紅燈亮起時也不見得能過完馬路。

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坐車的」、「開車的」們心裡可以平衡了。



颱風山竹襲港

九月份的日子，在我印象中常發生大件事，並非好日子。猶記得17年前，在美國紐約發生911事件，驚動全球，這個慘事深刻記在心裡。至於今年九月，天災人禍都出現了。「飛燕」颱風襲日本，造成嚴重災難，接着日本北海道又有地震災害，同樣令人震驚。在彼岸美國，颶風「佛羅倫斯」吹襲美國東部旅遊重鎮，據稱當局要求逾百萬居民疏散，可想而知，這個「佛羅倫斯」威脅美東多麼恐怖。除了人們生命財產受到威脅損害以外，當地因天災而受經濟損失，亦異常慘重。

地球彼岸受天災破壞，地球此岸太平洋有雙颱風吹襲，「貝碧嘉」來去匆匆，似乎並不兇惡。但接踵而來的超強颱風「山竹」，卻是來勢洶洶，據稱比去年吹襲澳門的「天鴿」、最近吹襲日本的「飛燕」颱風，風勢更強多了。執筆之時，「山竹」已吹襲菲律賓群島。當地政府嚴陣以待，當地市民蓄水蓄糧，搶購大米。據當局稱，若風勢狂猛，可能要求世界援助機構相助渡難關。

食食枕頭果石榴槌之後，根據習俗，最好是吃果后山竹以解熱氣。然而，此「山竹」並不是水果山竹之受歡迎。反而颶風山竹令沿途走過之太平洋地區大為緊張。包括香港、澳門和內地有關當局事先行跨部門會議，作緊急應對，以將損失威脅減至最低。就以港人而言，低窪地區之居民已受政府關照，遷到避風保護中心。很多市民以防萬一，在家裡貼上防風膠布，以策安全。現代資訊科技發達，公僕為市民服務之心非常積極。防風防雨準備工作做得很貼心，市民亦相當聽話，認真做好防禦工作。所以奉勸市民放開心懷，不用太緊張，切勿再在掛上風球之時外出或觀風浪，這是十分危險的事。在港居住數十年的老居民，必然記得當年颶風「溫黛」襲港，把一艘大船吹了上岸，那個情景至今還歷歷在目。

不幸事件接踵而來。突傳來前全國政協委員、世界著名攝影大師，享年102歲的老人家陳復禮先生辭世了。同是前任全國政協委員的芬姐與陳復禮先生是相識共事多年的好朋友。惡耗傳來，內心十分哀痛難過。恰好中秋佳節臨近，芬姐取出陳復禮先生多年前送給她的佳作《千里共婁娟》，睹物思人。芬姐衷心敬請陳先生好好上路，陳氏家族節哀順變。

不開心的事令人傷感，還是丟開煩惱事，看看近期股市迎來的逆市升幅。本來九月初期，股市連日大跌，恒生指數跌逾千點。卻又傳來美國邀請我國副總理劉鶴重開中美貿易談判。無論談判是否真的有效果，摩擦能否解決，敏感的股市投資者，亦趁稍有好消息而作反彈。不過還是老說話，世界形勢不明朗，又有思想複雜多變的搗蛋者，投資者身處其中，要明哲保身，如在風浪中攬緊安全帶，以保安全。



期待具內涵的新導演

在《大師兄》落畫前趕去看，因非假期而且中午場，發現戲院有不少長者觀眾，自從有長者優惠後，確是多長了長者觀眾入場看電影。雖然票房上幫助不大，但多了人看電影對製作人來講也是開心的。甄子丹、陳喬恩主演的《大師兄》，單看取名以為是江湖動作片，實為校園片，而且看完之後知道其實片名很有心思。

大師兄通常代表功夫好，除了武功好原來是班同學仔的真正大師兄。再細看介紹，甄子丹是該片主演、監製並兼任出品人，即套片由他界錢拍。出錢出力支持一個新導演闖家偉拍一部有教育意義的電影，意味着他有回饋社會。

正如子丹提到拍《大師兄》是件困難的事，是因發行商都想看他拍攝動作戲，今次能夠說服各方接受拍這個題材殊屬不易。但拍攝一齣教育電影是他長久以來的夢想，有志者事竟成，如今終圓夢。而且影片早前獲邀成為加拿大蒙特利爾奇幻國際電影節之閉幕電影，更入選 CHEVAL NOIR COMPETITION 競賽作品，對子丹來講是極大鼓勵。

導演闖家偉又是編劇之一，翻看資料，他2005年由場記開始，之後是副導演，包括《葉問》、《葉問2》，相信亦是和子丹結緣的原因。從電影的表達手法上說，《大師兄》當然不算高，有部分直來直往讓觀眾猜透情節發展，例如陳俠運用非常教學的手法，逐個化解每位學生的問題，揭發出陳俠是真正的大師兄，終

把全班學生收服。倒是設計一個黑社會大佬愛彈琴，和子丹演的陳俠讀小學已經爭冠軍結怨，到幾十歲仍鬥緊，最後用男人同男人的手法化解了結，效果幾好。

導演闖家偉透過這部片告訴大家：「家長的身教，老師的教學方法對一個人能否成才關係重大。」這是很值得讚賞的，他勇敢指出大家都覺得目前香港年輕人很有問題，但家長、教師只將責任推給政府和教育局，讓過於人，自己從不反省。

闖導演能做到拍片是想指出社會問題，表達意見，相信是從場記做起，跟上一代導演做事，形成電影要言之有物的風格，不似一些剛從演藝畢業跑出來就當導演，選題材嘩眾取寵，吸引傳媒炒作題材電影，不需理技巧手法。不過這些人一定是一片之後無以為繼。因為本來就未夠真材實料，怎配最佳導演？

早前香港演藝界內地發展協會多位代表成龍、曾志偉、王祖藍、古天樂、劉德華、莫華倫等向政府反映，香港電影現在的局勢是有大製作、小型製作也有，中型就欠缺，面臨人才斷層，促請特區政府宏觀統籌和梳理香港的文化政策，支援本地演藝從業者和小型藝人。若多些中型製作為青年人提供實踐機會，可以幫助年輕新一代提升水平。

所以「內協會」打算設獎學金，讓香港學生可以睇內地與各大演藝系系職高等學府學習演藝，多學習，多體驗。事實香港演藝學院電影系的師資真是嚇死人的。

藏在門栓上的父愛

前幾天，妹妹發過來幾張圖片，說自己都看哭了，問我是否熟悉。我一看，不過是一處老房子，室內地磚陳舊，窗戶框的油漆已經剝落，還有一個鏽跡斑斑的鐵門。儘管院落屋內收拾得乾淨利索，但是所有的一切都無法掩飾陰差走過的痕跡。

我一頭霧水，妹妹說你好好看看那個大門，難道不熟悉嗎？你仔細看看門上的小門和門栓。我稍微細看，頓時淚水奪眶而出。是呀，我怎麼忘記這扇門，這個我進進出出近十年的大鐵門。

利那間，我的思緒跌回三十多年前。如果說當時的鐵門都大同小異，我家的門絕對獨一無二，因為他是我父親精心設計找人製作的。在當時，最普通的門就是兩扇門正中處分別有個鐵管，一根鐵棍在門合上後，剛好穿過兩根鐵管，末端有孔，是掛鎖頭用的。門的外面也有鎖孔。稍複雜些的是在鐵管附近有個小門，手剛好能伸過去，人在外面也可以上鎖。

而我父親設計的門門，外人在外面即使手伸進小門也打不開，就是站在院裡，即使有我們家人的指點，也得研究一陣子才能打開。這個門栓由一大一小兩部分組成，呈L形，就是在普通門的鐵管末端處又通了一根稍微小的鐵管。有把把通過小鐵管的門栓拉上去，卡在缺口處，大門栓才能順利退回自己的管道，門才能打開。反之，門合上時，大門栓橫越兩根鐵管，然後拉下小門栓，小門栓穿過大門栓的鐵管正對的小孔，這時小門栓上的鎖頭孔就可以上鎖了。

想當初，這是父母單位分的房產，他們辛辛苦苦地蓋起這間大房子，是何等的珍惜和欣喜，而正是這座房子，陪我度過多少美麗的少年時光。現在回味起來，才明白父親為什麼精心設計這樣的門栓，而沒有採用當時最常見的門栓。因為那時父親在外地工作，只有母親帶着我們姐弟三人，那時我們還小，我最大，也只上四年級。弟弟還在幼兒園。父親能想到最安全的辦法就是加固這道門鎖，這道鎖他自己苦心設計，這結實的鐵門是他專門請人精心打造。當時有些感興趣的親戚朋友在院裡精心研究這門栓，可是在外面還是無論如何都打不開，更別提陌生人。

如今這門依舊在，門上的門栓還在，雖然鏽跡斑斑，但還是很結實，門上的每一顆釘釘我都那麼熟悉。妹妹說當她看到這門的時候，大門哭了，哭得很傷心，它說它苦等了二十多年啊，就盼着我們回去。聽完這話，我當時就淚崩了。從前父親很少和我們溝通，總是很嚴厲的樣子，我甚至曾經以為父親一點也不喜歡我們。可如今我深深懂得，就連一個小小的門栓都浸滿了父親的深情。

我不禁想起，我剛結婚的時候住的是七樓，父親並不怎麼來，即使來了也只是看看，並不多住就走了。後來我懷孕了，父親再來的時候，總是盯着我家的窗戶看，說，這窗戶不安全，我沒往心裡去，因為我沒有看到什麼不安全的因素，外面的窗戶是玻璃，裡面的窗戶是紗窗戶。後來孩子出生了，幾個月時

候，父親再來可就是帶着工具來的，竟然還有鐵絲網。我問要幹什麼？父親堅持說這窗戶不安全，孩子爬上去很危險。我說孩子這麼小怎麼爬呀，就是大些了也是有人看着，他怎麼可能上窗台呢？但父親不肯退讓，說說不安全，必須想辦法。

他讓我和母親帶孩子出去曬太陽。等我們回來的時候，我簡直哭得心都有，好好的兩扇紗窗，居然都換成了鐵絲網的，而且是密實的那種，甚至比過去人家裡養雞籠籠子的鐵絲網還結實。而且父親還別出心裁地在紗窗戶的窗框上和固定的窗框上釘上一個能上鎖的鎖頭孔，也就是說，我要是想再打開外面的窗戶，就必須先打開紗窗這道鎖。你說麻煩不麻煩呀？再說，這來個朋友什麼的一看，這是什麼呀！我對父親的自作主張很生氣，認為他太小題大做了。

父親臨走再三叮囑一定要時刻保證窗戶是鎖着的，如果做不到，他就把鑰匙帶走，不允許我們打開那兩扇窗戶。我無奈地同意了。直到後來有一天我從廚房進來，發現本來在地上玩的孩子不見了，順着聲音一看，他正努力地踩着凳子往窗台上爬呢！我這才明白父親的苦心。再後來每每聽到誰家的孩子因為家長看管不好而墜樓的事件，我就倒吸一口涼氣。

固執已見父親再一次把他深深的關愛藏在了鎖裡，這愛不光是給了我，還延續給我的孩子。

這世上有一種愛，不用任何華麗言辭表達，一道鎖足以。



紅芳

總是覺得計紅芳這個名字，有點當時時興的味道，但是不是如此，我也從來沒有向她本人求證過，因為和她接觸，才是實在的感受。

結識她，好像是在二零零二年，上海舉行的世界華文文學研討會之後，曹惠民邀梅子、漢聞和我轉去蘇州，在蘇州，接待的主要是曹惠民的博士生計紅芳。給我的第一個感覺，這位由農村出身的博士，從衣着到待人接物，還帶着十分純樸的味道，有人說是有點傻妹的範，我倒並不覺得，而她待人誠懇是為許多人所稱道的。

那次，幾個人去喝咖啡，說到某人的事，她很天真地催當事人，說呀！說呀！當然逼不出一個字來。結果大家廢然而止，此事說明她的天真，但也說明她胸無城府。

後來，她以博士身份，慢慢參與了世界華文文學評論界會議，同時，她又考取了國家漢語辦公室的公派教師資格，二零零七年至二零零九年被派到泰國朱拉隆功大學文學院中文系教課，恰巧，二零零八年，曼谷有個華文微型小說會議，我去參加了，和計紅芳相

遇，並和其他會議與會者應邀去主辦者的農莊度假。在曼谷期間，我發覺除了教學之外，她和當地文學界的交流頗多，頗融入當地的華文文學圈子。她有關泰華文學的評論，帶有在她的感受。

回來後，繼續她的華文文學研究工作，學術著作持續，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五年，她又被派去波蘭密茲凱維奇大學文學院中文系，進行文化交流，在歐洲轉了一圈，這些歷練使得她提高了見識。有人讚嘆，於今的計教授，已經洗盡土氣，變得洋氣了。

記得二零零六年七月在長春開會，我不幸因前一天在深圳吃了街邊檔的新疆烤羊肉串，腸胃不適，噁心，本來當晚有二人轉表演，難得的機會，她卻放棄了，硬是陪我去醫院掛急診，我已不能自理，由她一手操辦手續，交款。輸了幾瓶藥水，終於吐得一塌糊塗才舒緩過來，只是累得她夠嗆，我卻沒有向她親口道謝，但心裡的感激無限。

她尊重重道，從博士到教授，但對恩師曹惠民敬重有加。幾次到蘇州，曹惠民總會帶我們去常熟走一走，除了常熟毗鄰蘇州外，

還因為那裡有計紅芳。她不止一次接待過我們，自然更接待過其他更多的來客。記得有一次，她到蘇州，帶我們去常熟，路過沙家浜，不免下去逛一逛這地方，那裡豎着酒旗飄揚，讓人誤以為《沙家浜》裡的阿慶嫂就在面前。

我記得，去年(2017年)四月，一群人又去常熟，照例，計紅芳出面接待，陪我們看《華梅花》作者曹燁故居，帝師翁同龢故居等，其實以前我也去過。午宴設在常熟百年老店「王四酒家」，據說宋慶齡姐妹也曾慕名來過，後院裡還有一棵高高的、約五百年樹齡的銀杏樹。

此次不巧，紅芳不適，但她仍勉力盡主人之誼，陪我們到處逛，她的盡心，令客人們感動。大家都勸她回去休息，但她執意陪到最後，把我們送上車，才離去。我的思緒飄飄揚揚，又記起那年在常熟，她還帶着曹惠民和我，到尚湖望虞台喝茶。還有那一年，我在上海，她趕到復旦大學看我。當時好像是五一長假，火車站人山人海，擠火車之苦，由此可想而知。